

持續延展的生命傳記：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50至1960年代 臺灣原住民族的「田野照片」*

林文玲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本文援引攝影生態系統的分析框架，依時序先後，梳理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期間的田野攝影檔案，標註其生命傳記的三個重要節點：

（一）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納入攝影圖像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凸顯這批照片檔案的社會傳記。在此，攝影見證了實地田野調查，記述了田野工作的互動與科學性知識的產出及過程。沖印出來的照片圖像則輔助百科全書式的學科知識的呈現。（二）1950至1960年代攝製的實體照片歸檔與後續的數位建檔，指出照片檔案的物質傳記。類比到數位的物質／介面之轉換，使得圖像從圖片更為「自由」地游離出來。存活在0與1二進位物質世界的這批照片檔案，有了更為多元的運用可能，以及知識延伸路徑。（三）這批60年前的攝影圖像，藉由物質／介面的多元可能，因應變動中的學術思維、社會行動或事件，輾轉進入諸如學術公共化的場域及生態系統。隨著照片檔案從一個生態系統轉移到另一生態系統，它們的用途，價值和意義，亦即檔案的價值傳記也發生了變化。前述幾個可辨識的重要節點，其範圍或界限，本文一方面透過特定事例、活動，給予區辨、描繪與闡述。再一方面，將以此為基礎，探討中研院民族所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田野工作構想、知識

投稿日期：2021年3月16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1年6月30日

* 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當時主任劉斐玟、館員楊雯娟和許善惠，提供我照片檔案的借閱、耐心回覆我關於資料的諸多詢問；民族所資訊室陳人輝協助我進行相關檔案、資訊的調覽及釐清；林孟瑛、施博雯的全文閱讀與細心校對；以及匿名審查人具建設性的意見提問，在此一併致上最高謝意。

生產方式、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關係與權力互動之演變，以及從中反映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之發展與學科建制的重要身影。

關鍵詞：照片檔案，攝影圖像，物的生命傳記，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術建制化

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初始

中央研究院1949年遷臺之後，為了對當時為數約20萬的臺灣南島民族，以及在人數上佔優勢的漢人社會文化進行研究，於1955年8月1日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歷經10年的規劃及籌設，民族所終於在1965年4月間正式成立，創所所長為凌純聲先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2a, 2012b）。籌備期間的民族所延續創所學者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專長，以及民族學對異文化及少數族裔的學術關注，運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及經費，前往全臺灣各地的原住民族生活區域，推動臺灣南島民族的田野調查工作。

曾經服務於民族所籌備處的任先民先生，於〈中央研究院與我的臺灣原住民研究〉一文當中，記述了民族所籌備期間所進行的第一次田野工作：

排灣族的住地，佔了臺灣屏東縣東南部的大量地區，我們選擇了較為保守的來義鄉（臺灣光復後定名），作為第一次田野調查的目的地，由凌純聲所長領隊，李亦園和我陪同，並隨帶鄭格作為呼應。李亦園負責社會組織及其相關問題，我負責物質文化部份，同時注意採集標本，一共進住了兩個村落——來義村和佳平村，每村各停留七、八天，同時就近調查了萬安村，前後約四個多星期，因為是我們的初次調查，收穫雖多，但意猶未足。回到研究所，各人都有報告提出，並選擇了其中較確實部份，撰寫報告在《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刊出。自此以後，每次田野調查，都按照這種方式，提出調查報告刊登在《集刊》上。當時的調查報告，都是不夠深入的，因為時間不多，又是初步調查，所以刊出時都說明是「初步調查報告」。（任先民 2012）

發表在《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的初步研究報告，以田野調查所得資料為根據，擇定特定主題進行探討。《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1期4篇論文中，即有三篇立基田野調查資料的研究發表：〈臺灣的航海帆船及其起源〉（凌純

聲 1956），〈來義鄉排灣族中箕模人的探究〉（李亦園 1956），以及〈魯凱族大南社的會所〉（任先民 1956）。田野調查所搜集的豐富且多個面向的資料，讓後續利用更有充分的時間來整合田野調查參與者的分項資料收集，並以專書專刊的方式出版民族學專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書專刊甲種第一號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即是以達悟族人社會組織為主題之民族學專誌的首發嘗試。

中研院民族所籌備期間出版的集刊論文或專書專刊，多採納科學性架構呈現其研究成果，並透過文字鋪展其內容。文字雖為主要媒介傳達研究之理念及想法，然而論文之實際呈現卻伴隨不少照片，協力構成文章之內容與論點。這些用於論文當中的照片圖版，多是當時田野調查的同時所拍攝的黑白圖像。當年身負先行探道工作（以利後續田野調查工作）的任先民先生，探道之餘同時擔任實地攝影的任務：

為了田野調查的需要，以及〔民族〕所內攝影的便利，我（任先民）購集了一些攝影器材，設立了一間暗房，由自己沖晒、放大，田野照片供《集刊》採用，也翻拍文件資料供保存之用。我一九六〇年離開民族所時，已保存了不少記錄照片……。 （任先民 2012）

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由所方統籌組織的調查團隊，走訪了當時臺灣原住民9個族群所在，以及幾處平埔族群的生活場域。田野調查工作的同時亦透過照相機，記錄田野調查工作的各項活動與對象。跨越10年左右的調查工作，至1965年為止，累積為數不少的田野記錄圖像。這批田野照片記述的內容有：探查走訪的部落（之遠、中、近景）照片圖像、部落周圍的自然環境、在地植物、人物、祭典、物質文化、建築房舍、雕像、編織及器皿等。圖像內容若依照照片拍攝的先後時序進行閱覽，相當程度能夠掌握當時調查人員的移動痕跡以及行經之路線。雖然黑白照片年代久遠，亦能夠展示鏡頭所聚焦的人事物及其細節。

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的田野調查照片，不只提供鏡頭前人事物的微觀與細節，也將當時地處偏遠、不易前往的原住民族部落，透過照相機「拉近到眼前」。這些田野照片也因為「調查報告」的出版而廣為運用，流傳至今。跨越10年的田野調查照片，豐富並立體化每一次「初步調查報告」的文字敘述，輔助臺灣早期原住民研究的呈現，支撐研究假設及概念的具體化。這批田野照片不僅僅「記錄」了當時臺灣原住民族群的社會文化面貌，同時為早期臺灣南島民族研究留下可供再次尋索的田野足跡、知識系譜，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和發展、建制的重要身影。

二、照片檔案的生命傳記與攝影生態系統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50至1960年代所拍攝的田野調查照片，經由2002年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動，建置成為「田野照片」檔案資料庫。

「田野照片」數位檔案庫計有5000筆左右資料。¹「田野照片」最初拍攝的圖像可追溯至1953年台東蘭嶼達悟族的15張照片。²這批1950至1960年代的「田野照片」是透過相似的條件被拍攝而成，其數量達到相當規模，形成一種可以將它們「置放」在一起的邊界，成為一個集結（collection）：一個可以被命名的檔案。這些透過特定的想法、概念而被綁定在一起的「田野照片」

（及）檔案，實際上包含在空間上分開的幾處臺灣原住民族群之生活場域，以及場域中具「不同微觀歷史的許多部分之組合」（Gell 1998：221）。這些各個部份的組合是隨著時空流轉而有所變動，並將隨著相片（紙）、印刷、數位介面或行動載體的物質性延伸而重新組合，以及由此而（不斷）發展出來的社會關係。這些變動、延伸及發展，以不同卻各有偏重的方式糾纏在一起。相同地，如果意圖反向去認識、理解這些鑲嵌在一起的各個部份是些什麼，就必須從照片及檔案纏繞其中的節點將它一一解開。

1 2020年5月的照片數量統計。

2 請參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計畫成果網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7）。

作為「攝影檔案」(photographic archive)的這批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廣義而言指的是結合了某些目的及意圖，進而構成的一組歷史照片，一個集合體(Banks and Vokes 2010 : 338)。檔案既是某種目的之集結、組合，檔案也是照片或圖像坐落的空間場址。如同Jacques Derrida (1995 : 9) 在他的〈檔案熱：佛洛伊德學派印象〉一文中，闡述檔案一詞的辭源arkhe也來自希臘語arkheion一字，亦即房屋(house)、棲居(dwelling)、居所(residence)之意。既然是一所房子(在此為檔案)也就假定了包含和排除，隱含著這是誰的房子？誰有權進入？誰制定規範？誰解釋檔案？誰給出結論？由此推衍，檔案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物質表現，檔案因此也並非「中性」之物。檔案與現實世界非等同的關係，如同歷史學家Arlette Farge所指陳：「檔案既不忠於現實，也不完全代表現實。但是它們在這一現實中發揮了作用，為其他可能的陳述提供了差異與替代方案」(1993 : 5)。

檔案不等同於現實，與現實之間的有所裂隙，使得對檔案的意義、解釋以及檔案的社會關係，觸及的社會現實以及引發的效應有了許多探討的可能。即使以記錄為主題要旨的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期間的「田野照片」，在檔案集結以及單一照片的層次上，皆存在著與現實的多重接觸面以及探詢的可能途徑。由於檔案的建制化是在一定的時空背景，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物質條件之下進行。檔案所在環境以及各項條件的變動，影響著檔案的露出、流通以及使用。然而，若循著振興「文化分析中之客體」這一端點的研究取徑(Mitchel 2005 : 16 ; Bal 2002 : 8-10)，「田野照片」(及)檔案體現一種「物的文化傳記」(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的主動性視角(Kopytoff 1986)。這意味著能夠從個別照片或照片檔案的角度，講述它的一些生命故事：如何成為一個資料檔案，檔案資料之間的關係，與其他檔案建立何種聯繫，它(們)與人(們)之間，以及與其他物(件)產生哪樣的動態關係。

照片檔案的各種關係是發生在不同環境、條件的遭逢與匯聚(meeting)。這指出，照片圖像藉由(實質的或數位的)不同物質而移動，穿梭在不同時空與場域當中。因此，思考照片檔案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同時也是對其物質性(materiality)的思考(Edwards and Hart 2004)。進一步而言，照

片檔案（物）的移動及穿梭是發生在無數的流動（flows）之中，並全部被嵌入更廣泛的視覺經濟（visual economies）裡（Poole 1997：8），³或是捲入某個生態系統（ecosystems）（Edwards and Lien 2014：4）。⁴無論是強調照片圖像所在環境之相互生成的生態系統或著重產製、消費及制度鑲嵌的視覺經濟迴路，都不再以照片的圖像或內容為限，而是強調照片檔案的非線性相互連結（interconnectivity），以及流動性（fluidity）。亦即，照片的文化、社會及物質工作（cultural, social and material work of photographs）（Edwards 2012：221-226）。如此之分析進路，咸信對攝影物質（photographic material）、人與環境之間的連結及互動，具有相當的解釋能力（參考 Stylianou-Lambert 2019：378）。

「視覺經濟」與「生態系統」兩概念，於討論攝影圖像作為社會行動者與社會互動而來的產物，以及攝影圖像與物質如何產生相互關聯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視覺社會學者Theopisti Stylianou-Lambert（同上引：378）結合前述兩概念，提出具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異質組裝、開放及動態視角的攝影生態系統（photographic ecosystem）：

與各種參與者（人與非人）及環境互動的攝影物質，圖像（images）和圖片（pictures）的網絡。生態系統提供必要的脈絡／肌理，建議用途並為解釋提供依據。攝影生態系統包括實體和線上檔案、家庭相簿、藝術市場、展覽空間、報紙、社交媒體及照片共享應用程式等。

攝影生態系統的研究取徑，顯然偏離照片的內容及再現（representation）的既有探討模式，轉而關注照片、圖像、圖片、物質、介面、流通、管道，

3 關於照片的討論Poole教授認為，不僅僅探析它的內容及含意，並且需要把照片的意義放在照片的生產、消費、物質形式、所有權、制度化、交換、佔有和社會積累之間的流動關係之中，進行探討。

4 Elizabeth Edwards與Sigrid Lien所定義的「生態系統」為一組有著精細平衡卻至關緊要的互連、依賴、利益和威脅的系統組成；而且這套系統是透過實踐、物質、階序以及價值表達，維持其特定之環境狀態。

與人以及（類比或數位）環境，如何在不同的空間與時間，或社會文化場域當中遭逢、互動與關聯。從攝影生態系統的觀點，照片的社會顯著性及其功效是通過人與非人，以及人與物的網絡而活絡起來。在此，流動被視為物質實體（material objects），製造匯聚的機緣及意義生產的場域。此外，攝影生態系統不僅將照片的流動視為物質實體，並且將賦予照片意義的技術及結構囊括進來；並且認為技術與結構並非既定與被動，它們對於照片的意義生發起著積極的動態作用（Edwards 2012：223）。技術、結構、物質、移動形成了某種樣態的攝影複合體（photography complex），同時讓它有了「新的能動形式」（novel form of agency）（Hevia 2009：81）。這項攝影複合體通過攝影關係的集結、組裝，糾纏進入攝影圖像的意圖與實踐當中，並且在關係的演變中，動員新的物質實在（new material realities）（Edwards 2012：223）。或者如 Costanza Caraffa所言，如此才能將照片作為物質實體所夾帶的認識論潛能發揮出來（2019：15）。

以生態系統為名，意味著在移動、流動性以及混雜的關係或集結、組裝中，有其秩序與結構存在，並蘊含著關係屬性、質地以及價值。此外，隨著照片從一生態系統轉移到另一生態系統，它們的用途、價值和意義也可能發生變化。即使，由特定的時間與地點對照片進行周詳的探討，首先需要檢視其隨時間而來的生產、交換與消費（Kopytoff 1986）。這些生產、交換與消費勾勒著物的文化傳記的不同面向，Kopytoff因此主張，物同時具有技術、物理、經濟與社會多種傳記。換句話說，照片不斷移動、流動在大小不一、彼此聯繫在一起的攝影生態系統中，因照片鑲嵌的技術、物理、經濟或社會的作因，而累積它使用的痕跡以及意義的層次。事實上，攝影圖像在它的生命史的各個節點，都可以同時具有多個平行的傳記，譬如社會傳記、物質傳記或價值傳記等（Stylianou-Lambert 2019）。

本文援引攝影生態系統的分析框架，依時序先後，梳理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期間的田野攝影檔案，並標註其生命傳記的三個重要節點。

（一）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納入攝影圖像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凸顯這批照片檔案的社會傳記。在此，攝影見證了實地田野調查，記述了田野工作的互動與科學性知識的產出及過程。沖印出來的照片圖像則輔助

百科全書式的學科知識的呈現。（二）1950至1960年代攝製的實體照片歸檔與後續的數位建檔，指出照片檔案的物質傳記。類比到數位的物質／介面之轉換，使得圖像從圖片更為「自由」地游離出來。存活在0與1二進位物質世界的這批照片檔案，有了更為多元的運用可能，以及知識延伸路徑。（三）這批60年前的攝影圖像，藉由物質／介面的多元可能，因應變動中的學術思維、社會行動或事件，輾轉進入諸如學術公共化的場域及生態系統。隨著照片檔案從一個生態系統轉移到另一生態系統，它們的用途、價值和意義，亦即它的價值傳記也發生了變化。前述幾個可辨識的重要節點，其範圍或界限，本文一方面透過特定事例、活動，給予區辨、描繪與闡述。再一方面，將以此為基礎，探討中研院民族所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田野工作構想、知識生產方式、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關係與權力互動之演變，以及從中反映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人類學發展與學科建制的重要身影。

三、1950至1960年代田野攝影：「側錄」臺灣 早期原住民族研究

中研院民族所籌備期間透過田野實地調查進行蒐集資料。田野工作的同時也進行照片的拍攝。田野實地拍攝的照片，一方面記錄田調活動以及探查之項目，卻也提供了研究人員現場實地工作的事實佐證。這批拍攝於田野工作當下的照片，通過合併於研究成果之書寫，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以及民族所專刊甲種，而有許多露出的機會。這期間不只民族所出版品廣為運用照片，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人類學者的研究發表，亦可以觀察到數量不少的照片或圖版、繪圖的使用。一般而言，物質文化主題的文章或專書，有較多照片的使用，平均而言其圖文比例高於社會結構主題的文章或專書。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照片的使用多集中於該篇文章最後，以並排方式安排於同一頁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的田野照片使用，相較於集刊論文，在篇幅、空間、圖片安排及數量上有更大的彈性以及發揮的空間。以下這個小節主要以民族所初期最早的兩本專書專刊甲種（專刊之一以

及專刊之二)為對象,⁵整理1950至1960年代期間民族所研究人員,如何構思並結合照片,完備其研究成果的出版。立基在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籌備期間臺灣原住民族田野工作所獲致的材料,爾後寫成之專書計有:《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李亦園等 1962)、《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上冊》(李亦園等 1963a)、《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下冊》(李亦園等 1963b)、《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劉斌雄 1965)、《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丘其謙 1966)、《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阮昌銳 1969a)、《大港口的阿美族下冊》(阮昌銳 1969b),以及《筏灣: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石磊 1971)。

上述專書主題有探討社會組織結構、物質文化,以及田野調查報告的彙整等。這之中以物質文化主題的專刊使用最多照片,《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照片達213張;同一田野工作計畫關於社會組織的調查報告《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劉斌雄 1965)未使用任何一張照片圖像,兩者形成強烈對比(請參見表1)。這幾本民族學專誌大多將印有圖版的特別紙張,安插於相關章節前後。照片圖版的頁面多數沒有頁碼,以插頁方式置放於文字書頁當中,不計入內文總書頁,自成一個系統。《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丘其謙 1966)裡的照片,則有別於上述其他幾本民族學專誌的做法,而是將照片全數集中在整本書的最後,也就是中文全文的後面,英文長摘要之前。該專書的照片圖版編號I至VI,每頁一個編號,每一編號有兩張照片,共12張照片圖版。

5 本文著重照片檔案之生命傳記以及所處攝影生態系統之探討,而中研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之一以及之二,作為該機構學術出版的最初嘗試,在廣為運用田野照片圖像,輔助其觀點與論述的呈現,相當有代表性並深具學術發展意涵。

表1 9本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列表

民族所專書 專刊甲種編號	書刊名	出版年	作者	內文 頁數	照片 頁數	照片 數量	備註
專刊之一	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	1962	衛惠林與劉斌雄	167	22	24	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二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1962	李亦園等著	461	54	213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五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上冊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社化過程 第三章 社會群體 第四章 制度典章 第五章 超自然觀念	1963	李亦園、徐人仁、宋龍生、吳燕和	1-312	20	46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六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下冊 第六章 物質文化 第七章 經濟生活 第八章 個人生命史 第九章 結論	1963	李亦園、石磊、阮昌銳、楊福發	313-712	45	58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八	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	1965	劉斌雄、邱其謙、石磊、陳清清	268	0	0	無照片圖版
專刊之七	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	1966	丘其謙	1-266	6	12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十八	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	1969	阮昌銳	216	14	46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十九	大港口的阿美族下冊	1969	阮昌銳	217-415	12	41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二十一	筏灣：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	1971	石磊	193	22	40	附圖版目錄

林文玲製表

這幾本立基於實地調查工作而寫成的學術著述，結合田野照片的使用，意圖建立民族學研究及書寫之科學典範（何翠萍、蔣斌 2014：15；何翠萍 2019：12）。歸納它們對照片的使用，有幾種主要方式：將照片圖像運用作為文字或主題的說明輔助，或作為田野人事物有形、可見的引證；勾勒事件或場景，或藉由一系列圖像拆解、記述工藝製作的程序以及動作細節；主要報導人的照片；照片圖像提供某事物或現象「之前以及之後」的比較，藉視覺圖象闡述時間、過程及變遷。

（一）攝影圖像輔助百科全書式的民族誌呈現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一號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兩位共同撰述者衛惠林與劉斌雄說明此書出版之緣由：

烏居龍藏的《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1902）可以認為是一本啟蒙的民族專志，比岡松參太郎所領導的舊慣調查會的兩套報告書（1913-1922）問世更早，更像民族志；而後者正好缺少了雅美族部分，一直沒有補充起來……事實上兩書的性質與重點根本不同；烏居的報告書側重物質文化的記述，對於社會組織宗教習慣甚少注意；而後者則完全置重心於習慣法、傳說、部落組織方面；但他們所發表的報告書實在是調查紀錄，未加分析說明。這兩種研究傾向很奇妙的影響到後來的工作……。（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iii）

當時關於蘭嶼達悟族的研究發表，多偏向物質文化及相關禮儀，並有圖錄為主的 *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 一書的出版。《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則專注在社會文化結構方面的分析探討（同上引：iii）。該本調查報告的資料，源自於1957年民族所人員在獲得美國亞洲基金會的資助之下，有機會前往蘭嶼進行為期三個半月的民族學調查。此次田野活動針對蘭嶼六個社之住民的戶口、系譜、家宅、漁船組織、灌溉系統與土地所有關係，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和禮俗習慣等進行全面調查。回到民族所之後，參與調查之人員彙整調查活動所得資料，並「有意無意中嘗試寫成了一部以社會結構為中心的新型民族學專誌。這在英美早已是司空見慣，但在中國還是初次嘗試」（同上引：iii-iv）。

民族學專誌在此有兩重意涵，一為對蘭嶼島上住民及其社會文化，實施民族誌田野調查工作；另一為整理、分析民族誌過程蒐集得到的相關主題資料，透過理論的濾鏡，書寫研究成果、進行發表。《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對於民族學專誌的想像及落實，在其章節目次清楚可見。第一章住地環境與文化適應方式；第二章人口與家族構成；第三章父系世系羣；第四章雙

系血親羣與姻戚關係；第五章婚姻制度；第六章親屬關係；第七章名制；第八章分工合作與共勞團體；第九章財產制度；第十章社會威權、制裁與復仇；附錄一蘭嶼雅美族的系譜；附錄二有關蘭嶼及雅美族參考文獻目錄；英文摘要。正文目錄之後依序列出：圖版目錄，附圖目錄，地圖目錄，附表目錄。

衛惠林與劉斌雄兩位作者開宗明義指出，該書各個章節的撰寫皆以田野材料為基礎鋪展其內容，坐實以經驗性材料為本的實證研究取徑。

本報告書（《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除了一般記述說明以外，儘量把原始的證據事實提供出來。如村落圖、系譜表、漁團名表等，都作為附錄印在前面或後面。讓讀者可以在那裏查校出社會組織的參與關係。自然我們並不能把所有的原始材料都發表出來，而在許多方面只能舉例說明，但相信這些已足以表示所根據材料的原始性了。（同上引：iv）

這段話強調報告書內容都是有憑有據。地圖、各社平面圖、人口統計圖表、世系圖、親屬關係圖等，都是蘭嶼住民社會文化事實的不同表述。《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善用圖表、地圖（10件附圖、7張地圖以及53張附表）以輔助文字描述，進而烘托其論點。兩位作者列舉的「根據」之物雖然沒有照片圖像，不過該書卻提供一份條理清晰並標明拍攝者是誰的照片圖版目錄，並將其編號至22，其中兩個編號之下各有編號上、下兩張，全書總共24幅照片。24幅照片的目錄及照片說明，如表2所呈。

表2

圖版目錄			圖版說明	圖版所在頁碼
編號	標題	面對頁數		
1	蘭嶼遠眺	x	蘭嶼遠眺—自輪船甲板上向東方海上遠眺，所見之蘭嶼全景。（任先民攝）	x
2	椰油社外海岸風景	xi	椰油社外海岸風景—左邊的獨立岩石（i/an）（任先民攝）	xi

圖版目錄			圖版說明	圖版所在頁碼
編號	標題	面對頁數		
3	(上) 紅頭社鳥瞰 (下) 漁人社鳥瞰	16	上 紅頭社鳥瞰—上方為海岸及船港，社內家屋，屋頂橫向者為住屋，縱向者為工作房，其小型有木樁者涼臺，其周邊為石垣，圖之下右角為水芋田。 下 漁人社鳥瞰（劉斌雄攝）	16
4	(上) 椰油社全景 (下) 朗島社全景	17	上 自村前獨立岩上俯瞰椰油社全景—左下角白色屋頂下為船舍，山下中央一片白色屋頂為全社家屋。 下 朗島社全景，社前面沙灘為該社漁船進出港口。（劉斌雄攝）	17
5	水渠道（一）	32	水渠道（一）紅頭社社民正在修浚水渠，工作場在引河水入渠口處。（衛惠林攝）	32
6	水渠道（二）	33	水渠道（二）社民正運石塊砌渠壁。（衛惠林攝）	33
7	粟收穫祭（一）	54	粟收穫祭（一）中央為粟穗堆，其周圍圍同一父系世系羣之男性，等待族長舉行祭儀。（Inez de Beauclair 攝）	54
8	粟收穫祭（二）	55	粟收穫祭（二）同父系羣男性集體舂栗場面。（Inez de Beauclair攝）	55
9	喪葬（一）	66	喪葬（一）死者之男性近親，在喪家周圍驅除惡靈。（Inez de Beauclair攝）	66
10	喪葬（二）	67	喪葬（二）死者之男性近親，背運屍體自喪家出發前往墳場。（Inez de Beauclair攝）	67
11	飛魚漁始漁祭	78	飛魚漁始漁祭—船長盛裝，頭戴銀兜手持祭刀，向天神（tau qu tu）祈禱。（任先民攝）	78
12	飛魚漁—漁船組組員正上船出海	79	飛魚漁，在夜間進行，一漁船組組員正上船出海。（任先民攝）	79
13	東清社漁船	90	東清社漁船（劉斌雄攝）	90
14	野銀社港口的漁船及船舍	91	野銀社港口的漁船與船舍（劉斌雄攝）	91
15	東清社曾祖父輩老人	112	東清社曾祖父輩老人siapun-kotan	112
16	雅美族之家族在工作房前	113	雅美族之家族在工作房前（Inez de Beauclair攝）	113
17	新房落成祝典（一）分配禮肉	126	新房落成祝典（一）椰油社siapun ologun在其新工作房前持裡刀，分配禮肉。（衛惠林攝）	126
18	新房落成祝典（二）分配禮芋	127	新房落成祝典（二）分配禮芋。（衛惠林攝）	127
19	財富跨示（一）男性身邊財物	152	財富跨示（一）東清社siaman-nolain誇示其身邊財物，右手持禮杖（ipatsikakat）左手持禮刀，頭戴女用禮笠足下置銀兜。（衛惠林攝）	152

圖版目錄			圖版說明	圖版所在頁碼
編號	標題	面對頁數		
20	財富跨示（二）女性身邊財物	153	財富跨示（二）紅頭社si-kamutun盛裝，胸前戴飾珠串及貝飾（raka），身著禮服（ajub）。（衛惠林攝）	153
21	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一）	168	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一）各鬪士頭戴藤兜，上身著藤甲，手持長刀形木棒。（Inez de Beauclair攝）	168
22	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二）	169	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二）兩敵對社民，在河口對敵之假想陣容，圖左側為攻擊一方，右邊為防禦的一方，其隊伍背後，是一羣輔助人員，為之拾集石頭（Inez de Beauclair攝）	169

林文玲製表

《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中的24張照片沒有如同圖表、地圖、社會關係各類圖示，被兩位作者列舉為用來完備科學性分析，以及論證形成的支撐物件（兩位作者的用詞：「根據的材料」），卻在章節主題的提示、主題要旨的傳達上，扮演著提示以及畫龍點睛的功能。該專書圖版1至圖版2的標題依序為：「蘭嶼遠眺」以及「椰油社外海岸風景」，兩張照片於圖像和文字上，都意圖傳達一種由遠而近、渡海而來長路遙遙的旅程。這項旅程的視角來自於即將抵達蘭嶼的人類學研究團隊。這兩張照片之後則是六張地圖，分別為蘭嶼地勢圖、紅頭社平面圖、漁人社平面圖、椰油社平面圖、朗島社平面圖、野銀社平面圖。該書第一章接在這幾張地圖頁面之後正式登場，其章節標題：「住地環境與文化適應方式」。第一章結束，翻頁再度出現一頁雙面印有照片的圖版。前頁兩張照片標題為「上 紅頭社鳥瞰—上方為海岸及船港，社內家屋，屋頂橫向者為住屋，縱向者為工作房，其小型有木樁者涼臺，其周邊為石垣，圖之下右角為水芋田」，以及「下 漁人社鳥瞰」。背頁：「上 自村前獨立岩上俯瞰椰油社全景—左下角白色屋頂下為船舍，山下中央一片白色屋頂為全社家屋」，「下 朗島社全景，社前面沙灘為該社漁船進出港口」（請參考表2）。

如同上面所做的陳述，《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每一大章節開始之前或章節結束之處，都安排了與前面或後面章節主題相關的田野照片。以第八章「分工合作與共勞團體」為例，章節開始前的照片是某一家族成員在工作

房前的合照，接在該章節後面有一頁圖版前後共兩幅照片（圖1）。正面頁圖說：「新房落成祝典（一）椰油社siapun ologun在其新工作房前持禮刀，分配禮肉（衛惠林攝）」（請參考表2）。背面頁圖說：「新房落成祝典（二）分配禮芋（衛惠林攝）」（請參考表2）。正面頁照片與平躺開來相鄰書頁的文字有所關連及呼應：「到屋頂蓋好，立即開始籌備盛大的家屋落成饗讌儀式mivarai。自此儀典中有收掘禮芋……饗讌當天的招待客人，分芋，分从豕豕工作則又只限於近血親及直接姻親者幫忙」（同上引：126）。



圖1 林文玲翻拍自（衛惠林、劉斌雄 1962）

除了人物照片之外，《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中的圖版內容包括環境地景、有或沒有人物的物質文化物品、象徵性物品、儀式、祝典，以及非日常事件，譬如Inez de Beauclair拍攝「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主題（請參考表2）。該書照片之拍攝如同那一時期民族誌用途的照片拍攝，其主要原則在於要求圖像的準確性。此種攝影準確性，通常以一般能見度的照明進行拍攝，以求圖像之清晰而明確。在此，照相機的位置將是清晰度的一部分：照相機通常不會呈現傾斜，而是不偏不倚地與對象在同一水平視線。如此之距離與水平，給予照片平穩「觀察」的質地，以及圖像（彷彿）沒有中介的直接性，一種目睹、見證的效果。藉由前述之視覺刻寫技術，預期將大大提高民族誌圖像的科學性，並在「框限」觀看者注意力的同時，讓觀者對照片中之人事物得出某種樣貌的理解。這項理解也將透過圖版精簡標題之「協力」而引發出來（Edwards 1992）。從觀者的角度延伸探討，照片圖版若從書頁獨立出來，照片圖像自身能否自行傳達作者意圖鋪展的內容及意指？關

於傳統民族誌文本中靜態照片的「示意」能力，Mary Price（1994：5）的看法是，行文脈絡當中需提供具描述性的文字，這才使得看到照片（意涵）的行為具有說服力。

確切地說，以文本為中心（text-centred）的角度來看，圖片在出版品中的位置及其標題或說明乃至註釋文本，在於提供指引、鋪陳路徑，讓觀者能夠循線穿越「淺書寫」的照片（Hastrup 1992），深入一些地去知悉圖像之訊息與內容。作為媒介的指引（說明文字）、提供的中介，左右著照片如何被感知以及訊息將怎麼被接收。透過文字說明以及書頁版面上的安排，照片作為輔助性功能，有機會發揮出來，達成它被賦予之任務。總體而言，《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相當程度將攝影圖像合併到民族誌的書寫及呈現當中，實現照片作為證據—物件以及輔助性角色與功能。這項合併攝影的學術實踐，符應Bronslaw Malinowski深思熟慮地將田野照片納入其文字為主的民族誌，以及由此而建立的科學性民族誌／工作／方法與書寫之典範（Young 1999）。

（二）報導人現身佐證的田野研究

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第二號的《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李亦園等1962）有別於第一號專書專刊以社會組織為主題之外，其圖版數量達213幅，遠遠高出同時期其他本專書對照片的使用。當時的馬太安調查計劃前後近兩年，自1958年9月到1960年2月間，由民族所同仁共同參與，研究團隊工作人員前後共14人。「在田野工作時，為我們報導和翻譯的阿美族友人甚多；其中最重要的報導人是馬太安社總頭目何有柯unak tavon、連再芳isin tavon和張阿湖loho lets諸長老」（同上引：3）。總頭目何有柯unak tavon及連再芳isin tavon兩位先生的全幅照片置放在該書目錄頁之後，正文開始之前（圖2，圖3）。全書所有照片圖檔並未在目錄頁有所列表，也沒有註明在書中的所在位置，亦缺乏圖版標題等資訊。對於照片圖版的整體說明，僅見諸於正文第一節「緣起」部分：「照片圖版附於各節之後，圖版號皆用中文大寫」（同上引：3），這些照片均沒有註明由誰拍攝，不過「照片圖版的暗房攝製工作則全由本所鄭格君負責」（同上引：3）。由於該專書專刊是一本集體著作，

「每一工作人員都分別負責若干項目」（同上引：2）。個別作者在其負責的章節中，「都把他們的報導人和翻譯人的資料交代得很清楚」（同上引：2-3）。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全書共12節，由9位作者撰述。「根據報導人……」如此之類的文字（大多沒有附報導人的照片圖像），是該書多數作者介紹其報導人的方式。至於如何認知報導人提供的材料或扮演的角色，作者之間各有幾許差異。「下面是根據何有柯、連再芳、陳阿順三長老的報導所作的輯錄。雖僅屬大概，然何連兩位均身歷其境，其所述說，應是相當正確」（徐誠孚 1962：46）。「很感謝何有柯、張阿湖、連再芳、江福成、蘇健興等地方耆老的報導……。盡管這些資料是些支離破碎的東西，我們還可由這些資料裏，看出馬太安阿美族人在如何應用他們的智慧去巧妙地適應環境」（丘其謙 1962：59）。相對於不見「身形」圖像的章節主題報導人，置放在全書最前面兩幅主要報導人的獨照，顯得相當突出並意有所指。

兩位主要報導人的照片圖像，應是民族所研究學人員從許多照片中精心挑選出來的。總頭目何有柯unak tavon先生的全身照，清楚表露所穿戴的衣物及衣飾，以及所彰顯的部落領袖的責任與工作任務：「如有重要場合，頭目必須頭戴大禮帽，手持木杖赴會」（凌曼立 1962：126）。連再芳isin tavon先生半身照的圖像，以中景、水平視線呈現，有著穩定及平起平坐的效果。這兩幅田野報導人的獨照，對應Malinowski在田野中，有時照相機隨則在旁，與研究對象一起入鏡的畫面，所傳達的更傾向一種透明、無中介的意涵。亦即：本書所言以及內容悉數來自報導人，甚且是一種當地報導人向讀者「直面」講述的。承接兩主要報導人／圖像如此之視覺性隱喻，每一章節作者努力將自己從報導人身上所獲致的材料，各自想方設法就其負責的主題加以整理以及書寫。作者們的寫作與民族誌構念之間起著密切互動，來回琢磨資料與圖文之間的更為適切的關係與安排，進而有憑有據地完成自己分內負責的工作分項。

林文玲翻拍自

圖 2

本圖由土庫族人提供並由李亦園等
攝製 1962 年 10 月

圖 3

林文玲翻拍自

本圖由土庫族人提供並由李亦園等
攝製 1962 年 10 月

圖2 林文玲翻拍自（李亦園等 1962）

圖3 林文玲翻拍自（李亦園等 1962）

文字描述難以完備的事件及活動，該書作者不少人則訴諸圖像之協助。「筆者在馬太鞍調查時的報導人，即該社的老頭目何有柯unak tabon年已近八十歲，他說幼年時曾看過從前石製的用作製樹皮布的刀和槌，並知道用法及做法。因此筆者請他做了兩把石刀」（同上引：101）。同一章節記述樹皮布製作，關於打製步驟，作者以文字仔細描寫打製過程，

打樹皮的方法是有一定的，初步是橫打，使縱列的纖維左右相混雜，再縱擊。如開始即縱打，可能很快地使樹皮裂開；在打樹皮時必須輕快地敲打，使樹皮的纖維變得鬆軟，打製得好的樹皮布可柔軟如毛毯。這時打擊的樹皮只有一面，另外一面可以看出反面打擊的樹皮是否完好，如有的地方打得不夠時，可由未打的一面看出，再重覆敲擊之，直至滿意為止（圖版拾貳：1-4）。（同上引：102-103）

另外一些情況則是，年老的報導人對於傳統技藝或技術的行將絕滅，感到相當惋惜。因此很樂意與研究人員合作，重演、重現某項技術或技藝，並讓攝影機記錄其過程，留下製作成品的確切模樣。

該書第十五節「陶工」為全書篇幅最多的一個小節，作者石磊先生鉅細靡遺地將觀察及訪談所得，配合製陶各個階段的連續圖像，捕捉其工作流程以及製作細節（圖4與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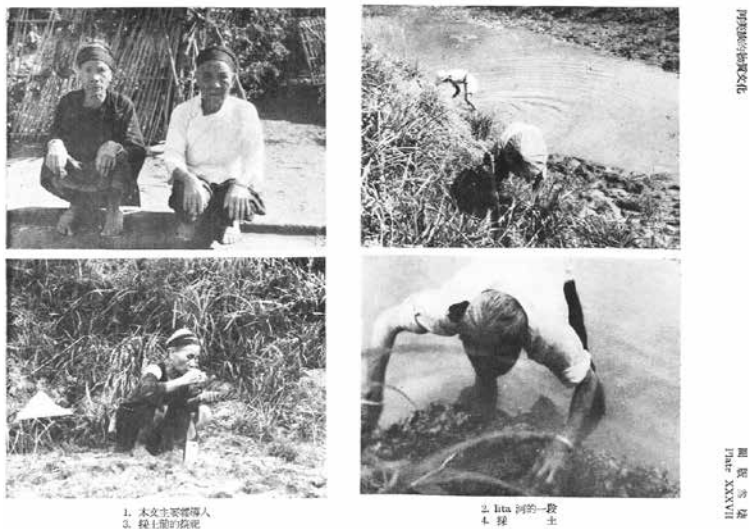


圖4 林文玲翻拍自（李亦園等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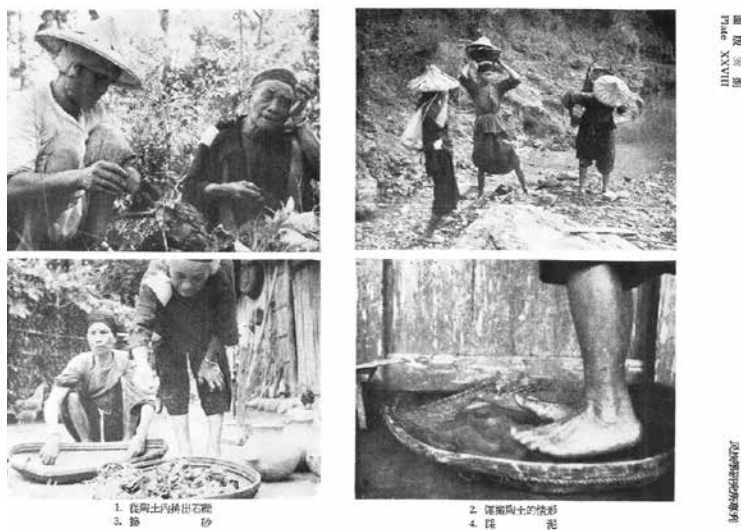


圖5 林文玲翻拍自（李亦園等 1962）

在調查的期間，筆者曾從兩方面著手詢問和觀察。詢問的目的在了解有關陶業的各種制度、陶器的功用及價值。觀察的目的在了解有關製陶的各種技術及程序。為了便於觀察起見，我還特地請了兩位沒有忘記製陶技術的老年婦女（圖版參柒：1）實地的作製陶示範表演。如果筆者能夠在技術方面稍有報導的話，也就是因為藉著示範表演幫助的緣故。（石磊 1962：254）

「陶工」章節最後有四頁圖版，每一頁正反面印有四幅為一組的照片影像，總計共32幅。照片依特定次序安排，畫面呈現根植於在地知識製陶技術的工序與流程，內裡卻註記了研究者專注的環節，以及循著「專注」而來的重點及細節。照片攝影過程亦記錄了民族誌工作的方式，以及對特定主題所實施的資料採集。攝影的鏡頭角度、距離和連拍，讓前述兩過程：視覺圖像呈現的製作工序，以及隱性的知識生產與民族誌過程，有了可以掌握的線索，也讓攝影記錄當下內含的「說明性」潛力（在之後）得以被重建。連續照片捕捉事件意涵也使得個別鏡頭裡的動作有了連貫性。專注而聚焦的鏡頭揭示了研究者不僅在旁實施觀察，而是參與陶工與製作，成為事件的其中一位成員。然而這些馬太安陶工圖像，卻不僅僅是田野工作的產物。照片清楚表明，這些圖像不只是由研究人員的興趣去決定鏡頭的「捕捉」與擷取。相反地，它們是田野調查過程的一部分，是通過研究人員與當地報導人之間的關係建立、詢問一回覆、意見往返、協商「表演」，和翻譯轉譯及溝通之複雜主體間際而被召喚起來。作為互動得以發生的重要場址，拍照的實施為1950年代末期馬太安「陶工」之民族學學科／科學登錄發揮了積極作用。

照片雖然被認為是某一事實之記錄，然而「紀實」本身卻是通過某些選擇，或設計過程而得出的結果。也就是說，即便是紀實影像，其宗旨也還是鼓勵著人們藉由它，而對世界的狀態及其運作方式得出一個特定的結論。這就如同抱持寫實主義理念產出之民族誌文本一樣，透過諸如第三人稱、見證報導式文字以及科學性修辭，以此向讀者傳輸作者看到的世界（Ball and Smith 2001：303-305）。此外，紀實的寫實主義其關注點與說服力有關，透過文字書寫或圖像拍攝，要求觀眾對所描繪的內容採取某一特殊態度。攝影

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來自攝影機「擬真」（物理特性的特徵）自動成像機制，這一機制成就照片的說服力以及它的權威。於此，1950至1960年代之田野照片圖像，有著對「真實」的無中介擷取與精確掌握，這對民族學之學科地位之奠定，以及科學與實證知識的生產，起著加乘的相當效果。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全書由不同撰述者合力完成，章節主題搭配大量照片以完備其描述與分析，這顯示了本調查研究所動用的龐大人力、物力、資金與時間，以及繁複的工作組織、協調、分配及執行。從田野實地調查、資料蒐集、彙整到研究成果的出版，每個環節都需要藉助機構性的組織及力量，推動其工作，實現其目標。以田野照片為例，拍攝階段對於主題、原則或方式的考量，圖像匯出階段的暗房設備及器械用品，放大、剪裁、編輯，以及出版印刷環節的圖像選取、版面位置及大小等，牽涉環環相扣的學術分工與專業分派。如果說《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作為1950、1960年代期間民族學專誌的代表，其呼應的是Malinowski將攝影確立為人類學民族誌研究工作的例證及輔助手段。《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一書顯露的則是人類學知識生產，如何通過機構性力量，推動田野調查、蒐集各類主題與資料，其中積累大批靜態攝影圖像，類近於Gregory Bateson與Margaret Mead將攝影和膠卷視為數據存儲及分析工具的構想與實踐（Bateson and Mead 1942）。而照片作為資料的載體與分析之工具，含藏巨大潛力，對後續相關研究產生作用、發生影響（Ball and Smith 2001：308）。

（三）小結

田野工作是民族學以及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家專業養成的重要步驟，通過田野實作保證學科知識的實證以及它的科學性。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籌備期間所推動的田野工作，將所內成員幾乎全數納入。每一位田野團隊參與者，皆被分派其任務，針對特定主題，實施田野探查、訪談以及參與觀察。這項由機構策畫與組織的田野調查工作，著重人類學「證據」的生產，其後之專題論文以及民族學專誌的書寫出版，服膺寫實主義的學科藍圖，從而奠定了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之初始與規模。這一時期的田野工作藉由團隊方式，蒐集口語、文字、圖表、戶籍等各類型資料，其中攝影／資料對於學科

性（disciplinary）之建立，扮演了提供證據以及完備文字敘述的重要功能。這批為數不少的田野照片，貢獻的不只是畫面上可見的人事物之訊息與線索。逆看田野攝影行為發生的當下，已然將田野中人與非人之遭遇及匯聚，內含於圖像生成之中，記述了拍攝行為所植基的脈絡、條件、物質、意圖及目的，同時凝結並記錄它的社會性和重要時刻。

藉由物的生命傳記視角梳理這批田野攝影之時空脈絡以及爾後形成的照片集結，得出以下觀察。1960年代民族所籌備期間，傾注機構性之力量，投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及研究能量，鎖定快速變遷、流失中的「他者／異文化」：臺灣原住民族群，進行田野實地調查，搜集研究對象／族群社會文化各層面整全性經驗資料，進而落實人類學民族誌的學科使命。田野工作的同時亦進行照片拍攝，記錄式攝影是田野工作的一個環節，烙印著研究旨趣及學科技藝之身影，卻也從中反饋及形塑了研究者觀看的焦點，以及因應鏡頭前事物而來的觀察以及視域動向。照片所承載以及含括的事物，隨著圖像被移置到學術論述之上下文，或民族學專誌的書頁裡，進而置身某／另一生態系統之中，提供知識的鏈結以及可能的進路，並生發其意義。在此，明顯看到這批田野照片為了什麼目的，由誰，以及經由哪些過程而被創建出來。亦即檔案物件之社會生命傳記的突出與展現。照片檔案社會生命傳記亦登載了攝影當下的事件及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這些互動決定了攝影檔案的內容、物質性、價值、用途和未來可被敘述的方式（Stylianou-Lambert 2019：379）。

凸顯田野實地探訪，資料取自於報導人的這一批實地調查照片，其內容包羅田野工作的每個主題，及其所牽涉的人事物。某一主題的各類照片大多會盡量被移置、使用於專題或專書論文之中，以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完備呈現。然而，當時的這些學術研究的公開頁面，卻幾乎未見有任何一張照片有研究團隊成員露臉的圖像。⁶研究團隊成員與研究對象或在地群體成員，譬如嚮導、報導人、翻譯、當地協力工作人員（如負責煮食三餐的受雇人員）

6 《南澳泰雅族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上冊》圖版16之4（位於第二章與第三章之間），圖像內容是室內圍坐一起的眾人。這張照片圖版說明：「老式家屋的室內一景，以火爐為中，兩邊是寢床」（李亦園等 1963a），並未註明其中一人為李亦園先生。

或公所、警務人員等，實際上於每次田野工作均留下不少合影照片。這些內涵某種關係性，記錄著彼此遭遇及交流樣態，並含藏著情感及互動質地的圖像，在那個時期的學術發表公開場域，卻成為「缺席」、噤聲不語的一群圖像。不過這些當時沒有機會現身的圖像，卻在往後不同時空境遇當中，成為具主導性的圖像，頻頻從微光之處閃現露臉，並夾帶著具歷史縱深、反思的話語聲響活躍現身。

四、機構建檔的「田野照片」：從類比到數位

1970年前後，中研院民族所將其探研重心擴及臺灣的漢人社會研究。這時期公開發表的學術論著，因研究對象、主題以及理論取向有所差異，已不再如同前一階段對田野照片的高度仰賴。⁷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拍攝的田野照片，如同上述提及的「合影」照片之命運，自此也逐漸進入「休眠」狀態。不再活躍於學術園地的這一批照片，就其生命傳記而言，則是跨越另一個節點，進入資料建檔的歷程。這一批照片早先以一張一張的照片實體，存於民族所博物館所屬單位當中，並由博物館人員手工整理：分類、排序，然後編碼、建檔以進行收藏。這批田野照片的資料建檔，從實體物件轉置到數位虛擬；意味著此些照片資料，從侷限在所方、院內流通使用的生態系統，漸次朝向外界開放的一個過程。向外開放，隱含著將觸及更廣泛的人事物，而透過網際網路連結之助力，將加速照片圖像之流通，提昇資料曝光及能見度，增進運用的頻率。換言之，從實體到數位建檔，圖像所著附的物質與介面有了改變，這賦予1950至1960年代的這一批田野照片有了屬於紙本圖像所難以企及的可能及效用。照片，更切確地說，數位世界中的照片圖像，有了更多的主動性，也讓其將從休眠狀態漸次甦醒過來。

7 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之間的原住民族物質文化以及相片之收藏相當豐富。1960至1970年代前述兩類收藏卻非常稀少，這是因為此一時期民族所的原住民族研究有了轉向。這一轉向包括的面向：學術研究之目標由搶救民族誌轉而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研究方法上由純粹描述轉為具有問題意識的取向；田野工作型態從團隊研究轉為個人研究；研究成果則從圖、文、物並重轉成僅有文字、數字與理論討論為主（何翠萍、蔣斌 2014：17）。

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同仁所拍攝田野照片，透過民族所「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進行資料庫建檔。「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先後隸屬於2002年開始推動的第一期「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年至2007年），計畫主持人為潘英海先生；以及第二期「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年至2012年），計畫主持人為當時民族所所長黃樹民先生。第二期計畫因應國家型計畫所標榜的重點及目標，擴充升級其計畫實施內容，更名為「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⁸民族所的「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雖然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實際上兩計畫之間有著緊密而不可分割的關係。

第一期計畫著重在民族所相關收藏品的基礎數位化作業，並建立人類學藏品資料之共同欄位結構。第二期計畫以第一期所累積之數位典藏資料為基礎，發展一套完整的資料典藏、管理與使用系統，一方面描述、整合本所各項數位典藏資料，另一方面也藉由將典藏品透過網站釋出，以促進不同單位間資料之交換與互通，並使研究者與公眾透過單一入口即能使用台灣人類學相關的資料與知識。⁹

表3

族別	地點	數量
魯凱族	魯凱族	188(119+69)
	泰雅族	743
	布農族	105
	卑南族	23
	阿美族	1411
	鄒族	33
	排灣族	1244
	台東縣卑南鄉大南村	69
	屏東縣霧台鄉	15
	高雄縣茂林鄉多納村	35
泰雅族	屏東霧台好茶	55
	台東縣卑南鄉大南	4
	台東金山	10
	桃園縣	40
	花蓮縣秀林鄉	51
	地點不詳	37
	宜蘭縣南澳鄉	615

林文玲製表

8 請參考中研院數位典藏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

9 請參考臺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網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7）。

表4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總數
1 泰雅							40	88	104	247	118	148		743
2 賽德克														0
3 太魯閣														0
4 賽夏				27								136		163
5 布農					12	1		18	43			31		105
6 鄒						26				7				33
7 邵														0
8 排灣			194	86	111	552	297	64				135	128	1567
9 魯凱				59		35		25						119
10 卑南				7	10			6						23
11 達悟	15				873									888
12 阿美					85	264	609	373	80					1411
13 噶瑪蘭														0
14 凱達格蘭														0
15 西拉雅									370					370

林文玲製表

民族所機構範圍內的收藏品以及歷年來積累的大量研究資料，經由數位化建檔以及網際連結，使得研究人員容易親近、方便瀏覽並進行查找。數位化及網路化同時允許多元格式或類型的資料及檔案，藉由不同條件或基準點的設定而被選取、排除、重新排序或匯聚在一起。2020年中旬民族所網站系統上傳的1950至1960年代的「田野照片」共計有4723筆。其中排灣族有1344筆，阿美族有1411筆，達悟族有418筆，泰雅族（包括太魯閣族）有743筆，魯凱族（包括隘寮群魯凱、濁口群魯凱以及大南群魯凱）有119筆，賽夏族有157筆，卑南族有23筆，布農族有105筆，鄒族有33筆，西拉雅族有370筆（請參考表3與表4）。這些數量與分項都不是最終版，透過勘誤、訂正或因應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群數將有所調整與更動。¹⁰總體而言，阿美族1141張，排灣族1244張以及南澳泰雅族的照片數量最多。不少南澳泰雅族照片圖像，曾刊載於上下兩冊的《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李亦園等1963a, 1963b），並於2018年「《獵與織》重逢半世紀—泰雅族KLESAN群文物返鄉特展」中展示。

10 2020年10月30日訪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負責田野影像原件之入藏、管理與保存維護工作人員楊雯娟。

沉寂多時的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1950s～1970s臺灣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5）（以下簡稱「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即大量運用1950至1960年代的田野照片圖像進行展示。2014年4月23日開展的「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次高度開創性的學術／展示／論述之舉措。該展覽實體展示為期一年，後續轉置為無限期的線上數位展。實體或數位展各有其特色與強項，並一致透過展示設計、物件以及相關活動，論述及反思中研院民族所人類學研究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該展示的實體或數位展皆成為里程碑意涵的重要事例。

本展覽由本所副研究員蔣斌先生及何翠萍女士共同策展。展覽中匯集了大量珍貴的田野影像、公文檔案、研究者田野筆記圖繪、文物及訪談影音，並透過多媒體技術及互動式展示設計，帶領觀眾重返1950-1970年代，看臺灣戰後第1、2代的人類學者如何秉持學理的觀點與學術的初衷，在當時國家機器與社會大眾的眼神都不太眷顧的偏遠地區，默默地實踐著多元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理想。¹¹

誠如展示緒言所述，該展覽匯集了大量1950至1970拍攝的田野圖像、公文檔案、研究者田野筆記、圖繪、文物，以及2014年前後研究者的訪談影音，共同營造為期一年（2014年4月23日至2015年5月31日）實體展演空間及其場域之氛圍。如此之展場設置，企圖帶出那一時期的人類學者如何秉持「學術的真誠與使命感」之精神與價值，「在原住民部落展開專業嚴謹的民族誌田野調查工作」的事件歷程；「並在〔田野實地談訪之後的〕各種可能的公開場合〔出版及傳布其學術成果與心得發表〕，鼓吹文化相對論的觀點」，如此鏗而不捨地呼籲，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對於非漢族群文化的認識與尊重」的社會效應（何翠萍、蔣斌 2014：14）。為了達成展覽的主題要旨，策展人及博物館團隊合併多樣化媒材開展其論述。多種視覺性媒材資料的協作與互動，完備該展覽主題，使其論述別具特色地凸顯出來。其中由

11 請參考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網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4）。

「6000多張的〔民族所博物館〕典藏影像中，精挑細選」出來的230張影像（劉斐玖等 2014：12），是展覽中光度、大小不一的亮點，扮演「吸睛」的角色（同上引：12），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

230張用於展示的影像，大多來自1950至1960年代的那批田野照片。¹²這些照片圖像與其他物件，在展示場域當中彼此匯聚，一同將「威權時代」、「多元論述」以及「學者與研究對象（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三個展示概念（同上引：4），進行演繹並加以體現、呈顯出來。之前，從未在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專題論文，以及民族學專誌露臉的「研究團隊成員與研究對象或在地群體成員」合照之圖像，經由「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的展示推動，變身成為一項深具活力的觸媒。透過這些圖像，人們得以更為接近行動受限及言論自由緊縮的時代氛圍，進而領略臺灣人類學者與原住民族人當時的互動情境，以及兩方建立起來的關係質地。「調查團成員與在地族人合影」（圖6）這一類型的圖像，早先在民族所刊登不少照片的學術論著的書頁當中，呈現「缺席」的狀態，而後更藏身庫房中的收納盒或檔案夾裡，近幾年才愈加頻繁地透過各式印刷輸出其圖像。總括而言，「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原住民族）」一起入鏡、共同在場的圖像，從一種隱身靜默的處遇，到當前甦醒活躍起來的狀態演變。



圖6 林文玲翻拍自「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線上數位展

12 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之間的原住民族物質文化以及照片檔案，較之於1960至1970年代之收藏與數量均豐富許多（何翠萍、蔣斌 2014：17）。

圖像的靜默、耳語或多話，¹³其聲響的有無，許多時候源自於它的「移動」。探討圖像之移動有其前提，首先需分辨圖片（picture）與圖像（image）兩概念之間的差別。W. J. T. Mitchell對兩者所作的分辨，非常有啟發性：「圖片是一個實物，是會燃燒或損壞的東西。圖像則是圖片中出現的東西，並且可以在破壞中倖存下來——在記憶中、在敘事中以及在其他媒體中的複製和痕跡中活下來」（2007：16）。實際上，圖像從它所著附的物質／框架，譬如某一張相片中游離出來，反而有了更多的「自由」以及連結的可能。當游離出來的圖像，因時空流轉或境遇更迭，輾轉進入某一生態系統，與另一些實體、物質或行動體（actant）諸如圖繪、筆記、字跡或聲音匯聚一起，進而生發意義的新樣態。

譬如透過與多媒體技術以及互動式展示設計的運用，圖像更有可能發揮其移動的靈活性。以「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現場展示空間為例，在「透過虛實、明暗、比例、形狀、尺度、秩序……等因子的穿插變化，再搭配物、聲音、影像、道具等媒介，提供觀眾一種平面及數位所無法取代的綜合性感官經驗與記憶」（劉斐玟等 2014：5）。從空間／媒介的視點，其媒介效應以及開啟的中介，圖像是其合力協作的一個部分。若轉換成圖像的主視角，其在實體展場立面牆上看似被動的吸睛角色，轉換至數位展示的介面，則有它的主動性與不同表現。「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的線上數位展區，圖像不似在實體展場空間，是配合著文字及其他物件進行分布，數位線上展的每個頁面，幾乎都有圖像的在場。網頁上單張或循環播放的圖像自成某種敘事格局，從而凸顯圖像引動故事軸線的積極動能。此外，線上數位展提供使用者或觀看者自由瀏覽及開放下載的可能，這隱含展覽中的資料、訊息（如圖像照片檔案）將更為流通、普及與傳布各方。在此，清楚看到數位展有著突破時空限制的潛力，讓展示／論述有持續延展的可能。

回到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檔案。這批照片上的圖像從較早之前的物質／介面，譬如書頁或相片紙張中游離出來，進到當前0與1二進位的世界當

13 歷史哲學家Paul Ricoeur將文件（譬如庫房裡的照片檔案）描述為「睡覺」，而當照片被喚醒，或者被賦予「聲音」，這些聲音從「喊」到「耳語」都是在「說話」（2004：169）。

中，因而展開了另一種樣態的生命歷程。物理實質或虛擬數位的介面或環境及其轉換，指出的即是照片檔案的物質生命傳記。圖像，尤其是數位化的圖像，較之於相片型態的類比圖像，在「移動」上有更多的彈性以及可塑性。加上網絡化的連結、串流，使得圖像移動處於加速狀態，並能夠以跨度式伸展轉進不同環境、場域，快節奏地變換其所處的生態系統。總體而言，圖像之移動藉由不同物質、介面，進入不同生態系統而活現其樣態。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實體展覽與數位展所立基的物質與介面是有所差異的，兩者各職所司，分別有其專精的事項。職是之故，物理實體以及支撐著線上展示的數位檔案資料庫，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卻相互聯繫的生態系統。兩系統中的圖像有不同的表現條件與方式，並講述故事的不同面向。兩者並不衝突，可以是協力互作的搭檔。

實體或數位展示的「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自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檔案揀選出來的圖像，「見證當時的原住民生活狀況與人類學者的田野狀況……充滿了懷舊的情感」（何翠萍、蔣斌 2014：18）。這裡的「見證」充滿著情感，與第三節提及的1960年代發表的人類學論著，將圖片圖像視為幾乎沒有中介的一種「見證」，提供科學性田野工作以及學科知識生產的有力背書，似乎有所不同。的確，兩種「見證」於觀看活動的主客體偏向，或圖像的部分或整體的強調上，有著不一樣的提示與重點。這些不同與差異，悉數內含於圖像自身，等待時機現身或被發掘而露臉。然而，看見圖像的哪些部分或強調些什麼，連動著感知、接收以及意義的效應。著重原住民「生活狀況」或人類學者「田野狀況」的體察，都在於鼓勵人們對某一圖像啟動氛圍式的看（ambient vision），以此真切地去感受、把握圖像場景中的物質狀態與它的環境氛圍。兩種「見證」亦暴露攝影與人類學的互動與質地：兩者合併或協力互作的知識生產，從一開始即處於證據（evidence）與情動（affect）之間的消長與辯證張力之中（Edwards 2015：236）。這些被徵召進入感知及意義構築場域的圖像，它們所植基／棲居的實體到數位的檔案本身，其圖像存活的环境也從證據空間轉化為潛在情動／影響空間。

五、轉動多重關係鏈結的照片檔案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展示中的「研究者的生活」主題之下，安排的幾張有代表性，能敘說故事的圖像（圖7）。研究團隊成員涉溪前往田野地，路途當中困在河裡。調查者與警員一起入鏡，攝影者從一定距離，遠遠地「快照」，圖像裡的人物，彼此「貌不合神也離」，並不像合意之下的團拍。研究人員與警政人員一字排開、並肩合照，有一種透過攝影機執行視覺「登錄」的味道。研究人員與在地男女老少（多數是小孩及兒童）族人簇擁一起拍照留念，傳達一種關係性以及彼此交流的質地。族人一起吃晚飯，坐在較外圍處，回頭望向鏡頭的研究人員，描寫了「正式」田野工作的「非正式」社會互動與重要場合。這類型照片多少揭露了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複雜而豐富的面貌，以及所植基的時空、政經社會、物質環境以及生活日常諸多脈絡。在此，圖像彷若一面鏡子，將彼時、它方之物「如實」框現在圖片的邊界之內；然而圖片卻又不僅是鏡子，也召喚、邀請閱讀者的能動及參與：（譬如點擊圖片，放大圖像尺寸，進而）穿越這面圖片—鏡子（圖7），以更為嵌入而設身處地去「觸碰」這些昔日與過往。



圖7 林文玲翻拍自「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線上數位展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中的田野合影照片，很長一段時光是處於不見天日的狀態。此些合影圖像，可以將它們歸屬為前面段落提及的「缺席的照片」。在學術發表園地中闕如的這些照片圖像，卻登錄了學科知識源起的最初場景，以及研究團隊與被研究群體間建立的關係、樣態與質地，當然這之中也承載著研究互動中的權力關係。與誰合影、快門按下時刻捕捉到的剎那神情、身體姿勢以及整體氛圍，都是探訪田野情境以及知識生產機制的重要線索。照片合影的人物，包括正式田野工作涉及的部落傳統領袖、嚮導、翻譯人員和各項主題報導人；地方行政警務人員；還包括接待研究人員住宿的家庭成員、為研究人員料理三餐的在地婦女等。這些照片的圖像內容，跨越了正式田野工作領域，以及非正式田野的日常生活範疇。檢索數位建檔的這一批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得知，每一次的田野工作行程，幾乎都拍攝了與當地人的各種合照，供機構歸檔與查存。



圖8 民族所凌純聲所長率領研究同仁赴來義進行首次的田野調查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每次田野工作必定拍攝的標準圖像：合影照片當前高頻率地被揀選、呼叫出來，作為展覽場域當中引領主題的靈魂／核心物件。自沉睡中被喚醒的圖像以1950至1960田野照片檔案中的一幅圖像最為醒目（圖8）。此幅照片圖像的館藏原始說明如此寫著：「民族所凌純聲所長率領研究同仁赴來義進行首次的田野調查」。凌純聲所長與研究同仁的第一次田野調查的這幅圖像，出現在中研院民族所2012年上線的新版網頁首頁最上方，以輪播方式進行展

演（圖9）。而這幅圖像是跑馬燈動態循環中，唯一經歷很長一段時間而沒有被汰換的一張圖像。這張圖像也被大尺度地被放大、輸出，穩重地貼附在民族所大廳博物館入門右前方紅磚底的牆面上（圖10）。同一幅圖像分別位於中研院民族所實體大門以及虛擬入口之處，兩者皆扮演為機構設定基調的重要使命。這幅高度象徵機構緣起、建制與發展的印記式圖像，在回看過去、望向未來的視域延伸中，傳達著關於機構學術志業及屬性、定位、實踐以及對自我的期許。



圖9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官網



圖10 林文玲攝



圖11 林文玲翻拍自「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線上數位展

上方同一圖像的幾幅「照片」可以理解為一種平行生命傳記的現象，它們各在不同物質／介面上活躍，遭遇其他物體、對象以及行動體，並在如此的聚合／解聚aggregation/dis-aggregation（Deleuze and Guattari 1984：286-288）的來回往返，鋪展理解的向度並生發其意義。平行生命傳記的概念亦提點了上述幾幅照片圖像，雖來自於同一檔案（庫藏）卻因進到條件有別的環

境（這個環境也時常是由資料或檔案／集結所支撐而運作），¹⁴而活在不同的生態系統當中。檔案如同任何其他生態系統一樣，其中某些生物（在此為檔案中的資料或物件）占主導地位，而另一些則未被注意到。「凌純聲所長率領民族所同仁的首次集體田野調查」這一幅圖像，迥異於之前長時間乏人問津的處境，今日成為具相當主導性的圖像／表徵。此幅圖像由晦暗沉潛至耀眼登場的更迭，也暗含著關於田野工作、民族誌以及人類學知識與範式的時空推移及構想演變。

植基於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集體田野工作的學術發表，運用不少田野工作時所拍攝的照片圖像，其中與報導人合影的照片在論文書頁中的闕如，是一種不在場的狀態。與報導人合影的圖像，遮蔽它、讓它缺席，其用意或許可以理解為，論文撰述者有意將「田野工作的複雜度」以及由此衍生的情境之模擬兩可或意義的含混不清，控制在一定的程度與範圍之內。如此作為，以達成彼時人類學知識範式所訴求的：在地觀點以及社會科學之條理、清晰與明確。依據Deborah Poole（Poole 2005）的論點，照片檔案有太多的歧出與枝節，常常使得意義過剩而有氾濫之虞，需加以控制，以免超出預期，削弱意欲傳達的訊息。遮住研究人員的田野身影，預期能夠更為凸顯在地族人及其看世界的方式與觀點。如此之圖像選擇，亦假設了照片圖像的透明、無中介性，以及攝影者／觀察者眼見為憑的視覺效力。

藉由光學般的科學理性，將田野中各式混雜的經驗性材料，轉為嚴整有序的知識呈現，確實大大支撐起人類學學科之地位，及其夾帶的學術權威。然而，這些知識的效力及權威到底由誰／從何而來？攝影者／觀察者的「現身」或隱匿行跡，提供前述問題深具論辯的反思。這讓我們有需要回到Bronislaw Malinowski這位（現代）民族誌奠基人物。專精於攝影的Malinowski將照片圖像與民族誌有技巧地給予結合（Young 1999：13，19，20）。他善用照片（及圖說），將之合併成為民族誌文本的組成要件，成功地營造民族誌（研究者）

「曾經」在場／證明（ethnographic presence）（Fetterman 1998：33）。正是，攝影逼真有力的效果和它的透明無中介賦予民族誌權威，並具體化了人

14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展示中亦有此張照片，請見圖11。

類學再現的想望／幻覺，進而宣稱：「這就是你所看到的，你和我一起觀察著……」（Clifford 1988：22）。

Malinowski有不少與初步蘭島島民合影的圖像。這些合影照拍攝當下其鏡頭涵蓋的範圍，不時有台供田野工作使用的照相機隨侍在旁。照相機出現在田野現場，有著鞏固研究者的在場／證明的意涵。照相機同時隱喻著研究者（光學般理性）如實的（彷彿照相機機械、索引性未經中介的刻寫）觀察。正是這些「在場」以及「如實」觀察，成就民族誌（者）的光芒；被研究對象在這一個瞬間則化為客體，由研究者代為發言，作者身分／著作權（authorship）隱然全數歸屬為學者所有。¹⁵延伸而言，某類照片圖像的有無以及圖像的內容及其指涉，能夠指出關乎「誰的知識」、「知識的類型」與「知識的構成」之政治與倫理層面的議題。上文提及的「缺席的照片」從沉潛到浮出，若從前述脈絡檢視「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到一種表象和意識層次上的變化。這即是，從早先研究者隱身幕後，只見研究對象前台露臉；轉變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一起現身，模糊了前台與後台之分野，讓渡了部分作者身分。若從照片圖像的視角來看，則是由一種證據展示的被動客體（passive object），翻轉成為具主動能动性，敘說些什麼的活躍主體（active subject）（Latour 1996：237），照片圖像在此被認可為一種情動—物件：帶有某種影響力的證據。

照片檔案的運用以及認知上的偏移，指認了研究者對這些照片圖像有了不一樣的想法，以及對它的價值的不同判斷。諸如證據—物件與情動—物件、過去與現在、使用（展覽、論述）或教育的價值等。某些價值，例如歷史價值、紀念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法律價值、教育價值及內在價值等，在某些時空脈絡、生態系統，比其他價值更重要。這即是從價值的面向檢視檔案的生命歷程。視覺社會學者Theopisti Stylianou-Lambert提議可以將檔案價值傳記理解為：「感知價值的參數，以及價值在各種情況下，在不同

15 Malinowski將這些照片用於民族誌專書之內容，亦經常成為Malinowski大學授課講堂播放的素材。Michael Young（1999：175，216）表示，就是這些不同類型的「在場」／證據／圖像，讓Malinowski的讀者、聽眾印象深刻、頗為折服，從而鋪墊了Malinowski在人類學史上無以比擬的地位。

人的手中如何隨時間而變化」（2019：286）。以此為依據，梗概整理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檔案的價值傳記：從田野攝影作為一種集結、被運用於輔助學術論點的鋪陳、機構藏品的歸檔及儲存，「存活」在比較圈限的學術生態系統。而後，歷經數位化以及網路化，檔案物質／介面的擴增及作用之下，得以加速進出學術或非學術（譬如科普、大眾讀物等）生態系統，擴大連結可能。生態系統的多元化偏移，在許多情況下，照片檔案被期望不只是被動的客體，而是能夠敘說的行動主體。當前開始能夠發出聲響的田野照片檔案，有的輔助學科反思其學科屬性、社會參與或社會責任；另有一些更跨足學術實踐、公共化以及學術權威釋放的場域（生態系統），傳遞關於照片檔案的價值與取向。

六、攝影圖像作為共作展示的情動一物件

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檔案由相對內在於中研院、民族所的資源生態系統，調撥至面向社會的開放檔案生態系統，人們對這批照片檔案開始有了不同的期望，以及如何運用它的各種想法。「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展示，即是其中一個想法的具體實現。這個展示由機構內部發出，對臺灣人類學發展、人類學的社會角色和參與，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進行開創性的回顧及反思。另一項與1950至1960年的這一批田野照片檔案起著千絲萬縷關聯的，則是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與原住民團體的「共作展示案」

（以下簡稱「共作案」）。民族所推行的共作案是一項「基於共作人類學的精神，鼓勵藏品來源相關地區、社群、機構、團體與民族所的研究人員共同提出非商業性展示的借展案」（胡台麗 2019：6）。民族所共作案，至今已舉辦了三次，分別為2017年於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的「野桐工坊」展出「『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以下簡稱「她方記憶」）；2018年藉由宜蘭縣南澳鄉武塔國小舉辦「《獵與織》重逢半世紀—泰雅族KLESAN群文物返鄉特展」（以下簡稱《獵與織》）；以及2020年「《召喚kaviyangan的記藝—回佳》共作展」，是在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法蒂瑪聖母舊堂進行展示。

移地展出的文物，大多來自民族所於1955至1968年間，所方人員採集、入館收藏的物件（何翠萍 2019：11）。1950、1960這期間為民族所籌備階段以及成立之初，推動幾次機構層級的集體田野工作。田野調查於蒐集臺灣原住民族群各個社會文化項目（百科全書式）的民族誌材料的同時，亦秉持「搶救山地文化」的使命，採集為數不少在地族群的各類型文物。田野調查的同時，伴隨田野工作中人事物各個面向的攝影，這其中包括了文物或涉及文物的照片圖像。六十多年前文物採集當下的攝影，除了保存、記錄了文物的形制、外觀及紋理、圖案之外，物件使用的場景、脈絡或所在環境、背景，亦透過視覺圖像而「登載」下來。1950至1960的田野照片因此多方提供線索，輔助共作展移展物件之選擇、辨認以及相關資訊之釐清。照片圖像於策展過程中亦時常成為記憶的媒介及通道，啟動人與物以及代間的追索及重新鏈結。這些照片圖像當然也是共作案現場，兼具展示以及空間佈置的重要物件。

2018年《獵與織》文物返鄉特展與1963年出版的上下兩冊《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有著高度互文性對話關係。民族所這方詳細閱讀了上下兩冊南澳民族誌專書，並特別挑出專書內容中，與該次展示主題相關，拍攝於1960至1963年間南澳的幾次田野工作照片。這些特別從1950至1960年田野照片檔案整理出來的照片，將用於展場展示之用。展示的照片需附上說明，然而民族所的這批照片館藏之說明多半簡略或訊息不明確。該次共作案提供絕佳機會，能夠一探老照片的「身世」，爬梳照片攝製的脈絡和相關訊息。正好南澳策展方因應共作展做了田調及訪談，對於老照片圖像中的人事物之釐清及其脈絡的掌握，較之館藏原有之說明，必定更為清楚而確實。¹⁶該次展覽展場老照片圖像總共輸出60張。主展板有7張，主要介紹當年民族所研究團隊以及南澳田野調查的翻譯人員（圖12）。影像牆有53張照片，呈現南澳昔日之地景風貌以及各式生活物件（圖13）。

16 2021年1月6日訪談楊雯娟。



圖12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圖13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主展版以及影像牆展示不同「類屬」的照片，指出了照片的選取及呈現，有著參與共作展示各方自身的著重，源出之脈絡，藉此意欲去凸顯的事物，以及從中透露的觀看視域。換言之，《獵與織》展示的照片圖像，相當程度是經由協商、取得共識而現身於展示現場。在此意義上，照片一物件是一項媒介及場域，讓人事物有所匯集，相互激盪或以此促動另一些事件與活動的運作。在《獵與織》共作展過程，亦針對《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關於當年研究團隊織布技藝調查時，族人「示範表演」織出

「三民主義」、「解救同胞」、「反共抗俄」挑織字樣的這件事（圖14），¹⁷有了一番對話及澄清，澄清的同時也讓不一樣的著重與看見浮現出來（同上引：14）。而這個「不一樣」的能夠浮現，在於共作展示的社會行動以及回到部落，所帶出的人與物以及其他行動體的碰衝、聚合。不同時空的聚合及境遇，讓觀看及視域有了轉動，使得脈絡、情境及參照（之事物）亦產生偏移。因此，當挑織有戒嚴、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口號／字樣的示範品，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收藏之後，隨著該「共作展示」回到部落時，誰是知識的主體這件事產生了翻轉。「已經不是〔當時〕人類學者想要了解織布怎麼織的問題，而是當年織者的子孫後代〔現在〕想要了解老一輩人怎麼織的問題了」（同上引：14）。



圖14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典藏



圖15 圖左：挑織了「三民主義」的泰雅族織布



圖右：刻有國民黨黨徽的排灣族木雕

林文玲翻拍自《人類學視界》16

2020年《召喚kaviyangan的記藝—回佳》共作案的照片圖像亦促發知識以及感知主體偏移的實際效應。該次展示的照片，大多來自1958年屏東泰武的實地調查工作時所拍攝的田野照片。其中兩幅圖像於博物館之原始檔案登錄之說明：「盛裝青年」以及「男子著綁褲」。透過佳平策展方進行的田野調查，在地族人頻頻端視老照片，終於「認出」好幾位老照片圖像中的人

17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亦展示此幅織布作品，請參考圖15。

物，是為族中長輩。爾後，展場圖像有別於民族所館藏「沒有名字」的人之狀態，前述兩幅照片其說明上終於有了長輩的族名以及中文姓名：「1958年佳平村謝華本maicus先生」（圖16），「後敵褲kacing穿著示範—1958年佳平村謝華晃kuljelje先生」（圖17）。謝華晃kuljelje先生彎腰側身示範後敵褲kacing如何穿著的照片，原始檔案是由四幅：俯身背面、半身正面、全幅正面以及側身全幅，形成的一組照片（圖18）。其中，側身全幅的這一張，除了由佳平策展方認出圖像主角是族中長輩，民族所館方人員更透過長輩穿著的上衣，其側邊上的紋飾這一線索，仔細查證，最後找到民族所博物館最為接近／相對應的物件藏品（圖19）。¹⁸在地族人或民族所這方，都借助了照片圖像所「記載」的人事物，展開各自尋索的足跡，並且在移動、進出時空或脈絡的不同疊層中，逐步接近路徑導向的「標的／所在」。照片一物件在此有著媒介承載訊息之功能，並能夠容納不同的各方進行協商、互動與交流；進而產生代間聯繫或知識脈絡縫補的中介作用。



圖16 林文玲翻拍自《召喚kaviyangan的記藝—回佳》共作展



圖17 林文玲翻拍自《召喚kaviyangan的記藝—回佳》共作展

18 2021年3月10日訪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負責典藏文物入藏、管理、保存維護，文物借展、調閱等各項工作業務的許善惠。



圖18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圖19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典藏

共作展的實施，推促在地族人或民族所人員透過紙本照片、數位圖檔、或書籍頁面上的相關圖像，進行比對、檢視各種線索，細微覺察圖像因時因地而來的裁剪、翻轉或併置的現象，以及從中顯現的意義（Edwards 2011）。圖像的移動、（進出不同）空間以及（著附的）物質（性），共同作用而產生效應。這些作用及效應，是在社會關係中被引發和起作用的。因此，觀看「過程中，照片是作為關係或分佈的對象而出現，它們融入了各種講述、觀察，以及在場，它們超越了照片表面視覺顯示的範圍，並融合了其實質性體現的內容」（Bell 2008：124-125）。移動在不同空間中也意味著，照片圖像以及圖像物質，散布於不同場域／生態系統，並指涉有所差異的微觀歷史。

六十年前的「田野照片」於半個多世紀之後的現在，藉由照片紙本或數位照片而將其圖像及意義持續製碼／解碼並傳遞開來。圖像的物質性或媒介，中介了不同的觀看之意圖、旨趣以及視野，或讓人、事、物以及行動體匯聚一

起。匯聚的動態以及動能，使得不同社會位置的主體在與照片圖像相互遭遇的時候，有機會開啟差異的認識進路、理解的脈絡，以及情動之樣態。在如此多元之路徑與時間性之間推移，有機會揭示Faye Ginsburg於討論原住民族人回看關於他們族群的民族誌歷史圖影所提出的視差效應（parallax effects）：「希望〔由此〕展示來自不同歷史時期與文化背景的人們，如何以不同方式解釋這些圖像」（1995：65-66，73）。藉由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圖像而產生的視差效應，隱含著對既有知識及權威，以及知識主體原有偏向的解消。進一步而言，誰是知識的主體？誰有權進用？誰制定規範？誰解釋檔案？誰給出結論？這些問題成為檢視知識與權力關係有否鬆動的關鍵指標。

我們用「共作」來強調傳承於人類學史中對人類學家與被研究對象之間collaborative關係的討論基礎。「共作展示」構想的產生就建立在民族所研究人員反思博物館策展以及詮釋館藏文物的權威性上。

「權力關係」的顛覆以及加強與原住民大眾關切的公共議題間之相關性，是提倡「共作」最核心的關懷。（何翠萍 2019：16）

「她方記憶」共同策展人「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針對運用大量照片圖像作為媒介與中介的共作案之推動、實施與實踐，有如下的觀察及反思：「促成此次文物回到部落，是在相互信任的誠意基礎上，通過雙方不斷的討論、修正方能成功的。……我們從各自的認知和行動中，透過彼此專業知識的交換、協調，合力完成任務。也創造了許多新的價值」（尤瑪·達陸 2019：43）。這些新的價值，翻轉了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長久以來不平等關係，也促動著兩者之間新的（社會）關係出現的可能。

七、結語

本文首先釐清攝影，以及攝影的產出：照片與人類學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進而將攝影與人類學關聯在一起。由於人類學知識的生產，是通過田野工作、學術性書寫、發表及流通等不同環節所共構而成。源自實地田野工作

的人類學研究，其知識屬性深刻烙印著眼見為憑的價值與判斷在其中。換言之，田野的親身經歷、共同在場、參與觀察／目睹，以及浸淫式經驗及其歷程，提供有憑有據的民族誌經驗性材料，確立並保證了人類學知識的科學屬性。以此為據，上文梳理了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的田野照片檔案，辨識其生命傳記的三重向度：社會傳記、物質傳記以及價值傳記。1950至1960年代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納入攝影圖像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凸顯這批照片檔案的社會傳記。2002年開始照片檔案從類比到數位的轉置，擴大這批照片圖像的用途，其價值和意義也因此產生轉變。照片檔案被運用作為學術公共化與社會實踐的觸媒，或經由照片圖像的媒介與中介對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進行重分配，進而翻轉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長久以來的不平等關係，這指出的是檔案的價值傳記。

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的田野照片檔案以及檔案中的個別圖像，從物的生命傳記給予追蹤，可以觀察到它們各自的生命曲線。這些曲線散佈到不同的時空或脈絡的疊層當中，累積它使用的痕跡以及意義的層次。曲線的出現意味著，檔案或照片的不斷移動、流動在大小不一、彼此聯繫在一起的攝影生態系統中。而這些生態系統具體而言，即是人類學學科的內外環境與時空脈絡的偏移與變動。如此之變動及其含藏的思維理念，可以從圍繞攝影及照片檔案而顯現出來。在「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關係」的演變上，從較早凸顯被研究對象的再現與修辭的模式，歷經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同時現身、突破前台後台之分野，到兩者共作協力的知識生產方式。如此之過程，標記一種認識論的轉向，以及由此衍生的「誰的知識」、「知識的類型」與「知識的構成」之政治與倫理的反思與實踐。在此，也觀察到照片檔案及其個別圖像如何從證據—物件到情動—物件的一種轉變。透過照片檔案挖掘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的多重意涵以及敘說可能，照片圖像的「視覺」稜鏡，同時映現著臺灣人類學的發展軌跡，中研院民族所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以及人類學學科建制的重要身影。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07 臺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 taiwan yuanzhumin shuwei zhishi juluo kaifa hezuo jihua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Phase II]。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ndaip.sinica.edu.tw/collection/page01_b.htm, 2020年7月31日 [July 31, 2020]。
- 2012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網頁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wangye [Website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Messages/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7135246736660&MenuId=530167135442323313&Fid=530167135362746635, 2020年6月13日 [June 13, 2020]。
- 2012b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首頁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shouye [Frontpage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ioe.sinica.edu.tw/>, 2020年3月7日 [March 7, 2020]。
- 2013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網 zhongyanyuan shuwei diancang wang [Digital Collection Network, Academia Sinica]。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ascdc.sinica.edu.tw/single_project_page.jsp?projectId=97, 2020年6月13日 [June 13, 2020]。
- 201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網頁 zhongyanyuan minzuxue yanjiusuo bowuguan wangye [Museum Website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Messages/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4225631412251&MenuID=710146310641013102&SSize=10&Fid=0&MSID=2016051110252632609, 2020年7月1日 [July 1, 2020]。
- 2015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線上數位展 weiquan shidai zhong duoyuan lunshu de xinghuo [Digital Exhibition of Sparks of Pluralism in an Authoritarian Era]。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parks.ioe.sinica.edu.tw/%e5%bc%95%e8%a8%80>, 2020年5月12日 [May 12, 2020]。
- 201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計畫成果網頁 zhongyanyuan minzusuo shuwei diancang jihua chengguo wangye [Website of Digital Collection Project,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ianthro.ioe.sinica.edu.tw/%E5%8D%9A%E7%89%A9%E9%A4%A8%E5%85%B8%E8%97%8F%E5%BD%B1%E5%83%8F%E6%90%9C%E5%B0%8B-2/>, 2020年7月31日 [July 31, 2020]。

尤瑪·達陸 Yuma Taru

- 2019 遇見與等待：記「她方的記憶」展 yujian yu dengdai: ji 「tafang de jiyi」 zhan [Encountering and Waiting: Remembrance of “Her Side’s Memory” Exhibition]。刊於[In]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 gongzuo: ji tafang de jiyi —taiya laowujian de buluo zhan sh [Collaboration: Remembrance of “Her Side’s Memory”-Tribal Display of Atayal Old Things], 何翠萍、尤瑪·達陸主編 Ho, Ts’ui-p’ing、Yuma Taru zhubian [Ho, Ts’ui-p’ing, Yuma, eds.], 頁40-57 [pp. 40-5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石磊 Shih, Lei

- 1962 陶工 tao gong [Pottery] 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aian ameizu de wuzhi wenhua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 頁253-290 [pp. 253-29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71 筏灣：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 fawan: yige paiwan zu buluo de minzuxue tianye diaocha baogao [Su-Paiwan: An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a Paiwan Village]。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丘其謙 Chiu, Chi-chien

- 1962 漁撈 yu lao [Fishing] 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aian ameizu de wuzhi wenhua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 頁59-83 [pp. 59-83]。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66 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 bunong zu kashe qun de shehui zuzhi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Take-Bakha Bunun]。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任先民 Jen, Shien-min

- 1956 魯凱族大南社的會所 lukai zu danan she de huisuo [A Study on Men’s House Tanan Rukai]。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 141-161。
- 2012 中央研究院與我的臺灣原住民研究 zhongyang yanjiuyuan yu wo de taiwan yuanzhumin yanjiu [Academia Sinica and My Study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史前館電子報 shiqianguan dian zi bao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Prehistory] 第236期 di 236qi [No. 236]。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beta.nmp.gov.tw/enews/no236/page_01.html?fbclid=IwAR2x4dfG3htEpudoL8G9D9Euf6oDeqqSAsrg14a8TCoMNqJrI9liim26vcQ。2020年3月17日 [March 17, 2020]。

阮昌銳 Yuan, Chang-rue

- 1969a 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 dagangkou de a mei zu shangce [The Makutaai of Eastern Taiwan, Volume I]。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69b 大港口的阿美族下冊 dagangkou de a mei zu xiac [The Makutaai of Eastern Taiwan, Volume II]。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何翠萍 Ho, Ts'ui-p'ing

- 2019 相認：記第一次共作展示案 xiangren: ji diyici gongzuo zhanshan [Recognition: Remember the first Collaborative Display Case]。刊於[In] 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 gongzuo: ji tafang de jiyi —taiya laowujian de buluo zhan shi [Collaboration: Remembrance of “Her Side’s Memory”—Tribal Display of Atayal Old Things], 何翠萍、尤瑪·達陸主編 Ho, Ts'ui-p'ing、yuma taru zhubian [Ho, Ts'ui-p'ing and Yuma, eds], 頁10-39 [pp. 10-3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何翠萍、蔣斌 Ho, Ts'ui-p'ing and Bien Chiang

- 2014 展示一段人類學的歷史 zhanshi yiduan renleixue de lishi [Demonstrating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y]。人類學視界 renleixue shijie [Anthropology Vision] 16: 14-19。

李亦園 Li, Yih-yuan

- 1956 來義鄉排灣族中箕模人的探究 lai yixiang paiwanzu zhong jimoren de tanjiu [A Study on the People of Tcimo in the Western Paiwan Tribe]。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 55-83。

李亦園等 Li, Yih-yuan et.al

- 1962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aian ameizu de wuzhi wenhua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63a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上冊 nanao de taiyaren: minzuxue tianye diaocha yu yanjiu shangce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ume I]。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63b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下冊 nanao de taiyaren: minzuxue tianye diaocha yu yanjiu xiac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ume II]。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徐誠孚 Hsu, Chang-fu
- 1962 狩獵shoulie [Hunting] 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aian ameizu de wuzhi wenhua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 李奕園等編 Li, Yih-yuan, et al., eds. 頁46-58 [pp. 46-58]。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胡台麗 Hu, Tai-li
- 2019 序 xu [Preface]。刊於[In]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 gongzuo: ji tafang de jiyi —taiya laowujian de buluo zhan shi [Collaboration: Remembrance of “Her Side’s Memory”—Tribal Display of Atayal Old Things], 何翠萍、尤瑪·達陸主編 Ho, Ts’ui-p’ing, yuma taru zhubian [Ho, Ts’ui-p’ing, Yuma, eds], 頁4-7 [pp. 4-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凌純聲 Ling, Shun-sheng
- 1956 臺灣的航海帆筏及其起源 taiwan de hanghaifanfa ji qi qiyuanzu [Formosan Sea-Going Raft and Its Origin in Ancient China]。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 1-64。
- 凌曼立 Ling, Mary
- 1962 衣服 yifu [Clothing] 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aian ameizu de wuzhi wenhua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 頁97-130 [pp. 97-13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劉斌雄 Liu, Pin-hsiung
- 1965 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 xiuguluan ameizu de shehui zuzhi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Aiu-ku-luan Ami]。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劉斐玟、曾瓊瑩、許善惠、楊雯娟 Liu, Fei-wen, Chiung-ying Tseng, Shanhui Hsu and Wen-Juan Yang

- 2014 用空間再現人類學史—以多維表意介面挑戰多元論述 yong kongjian zaixian renleixueshi—yi duowei biaoyi jiemian tiaozhan duoyuan lunshu [Representing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via Space: Challenging Multiple Discourses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al Interface]。人類學視界 renleixue shijie [Anthropology Vision] 16: 4-13。

衛惠林、劉斌雄 Wei, Hwei-lin and Pin-hsiung Liu

- 1962 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 lanyu yameizu de shehui zuzhi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Yami Botel Tobago]。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Bal, Mieke

- 2002 Travelling Concepts in Humanit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all, Mike and Greg Smith

- 2001 Technologies of Realism? Ethnographic Uses of Photography and Film.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eds. Pp. 302-319. London: Sage.

Banks, Marcus and Richard Vokes

- 2010 Introduction: Anthropology, Photography and the Archiv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1(4): 337-349.

Bateson, Gregory and Margaret Mead

- 1942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Bell, Joshua A.

- 2008 Promiscuous Things: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Property Through Photographs in the Purari Delta of Papua New Guin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5(2): 123-139.

Caraffa, Costanza

- 2019 Objects of Value: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Hierarchies in the Photo Archive. In Photo-Objects: On the Materiality of Photographs and Photo Archiv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Julia Bärnighausen, Costanza Caraffa, Stefanie Klamm, Franka Schneider, and Petra Wodtke, eds. Pp. 11-32. Publisher: Edition Open Acces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Berlin.

Clifford, James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4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Derrida, Jacques

1995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Diacritics* 25(2): 9-63.

Edwards, Elizabeth

1992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Tracing Photography*. In *Made to be Seen: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Visual Anthropology*. Marcus Banks and Jay Ruby, eds. Pp. 159-189.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Objects of Affect: Photography Beyond the Ima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221-234.

2015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A Long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Affect*. *Photographies* 8(3): 235-252.

Edwards, Elizabeth and Janice Hart, eds

2004 *Introduction*. In *Photographs Objects Histories: On the Materiality Images*. Elizabeth Edwards, and Janice Hart, eds. Pp. 1-1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dwards, Elizabeth and Sigrid Lien

2014 *Uncertain Images: Museums and the Work of Photographs*. Farnham, Surrey: Ashgate.

Farge, Arlette

1993 *Fragile Lives: Violence,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Carol Shelton,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etterman, David M.

1998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second edi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Gell, Alfred

1998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nsburg, Faye

1995 *The Parallax Effect: The Impact of Aboriginal Media on Ethnographic Film*. *Society for Visual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11(2): 64-76.

Hastrup, Kristen

1992 *Anthropological Visions: Some Notes on Visual and Textual Authority*. In *Film as Ethnography*. Peter Ian Crawford and David Turton, eds. Pp. 8-25.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evia, James L.

- 2009 The Photography Complex: Exposing Boxer Era China (1900-1901), Making Civilization. *In* 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osalind C. Morris, ed. Pp. 79-12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Kopytoff, Igor

-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Arjun Appadurai, ed. Pp. 64-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 1996 On Interobjectivity. *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 3(4): 228-245.

Mitchell, William J. T.

- 2005 What Do Pictures Wha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7 Visual Literacy or Literacy Visualcy? *In* Visual Literacy. James Elkins, ed. Pp. 11-29.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Poole, Deborah

- 1997 Vision, Race, and Modern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5 An Excess of Description: Ethnography, Race, and Visual Technolog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4: 159-179.

Price, Mary

- 1994 The Photograph: A Strange, Confined Space. Californi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 2004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ylianou-Lambert, Theopisti

- 2019 Photographic Ecosystem and Archives. *Photographies* 12(3): 375-394.

Young, Michael W.

- 1999 Malinowski's Kiriwina: Fieldwork Photography 1915-1918.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林文玲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1520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wandern@gate.sinica.edu.tw

An Ever-Extending Biography:

“Field Photo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i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Wen-ling L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a survey team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visited nine ethnic groups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s well as the living areas of several Taiwanese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During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process, their cameras recorded various activities and objects in the field. The survey work spanned about 10 years, and by 1965,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record images had been accumulated. The contents of this batch of field photos include: photo images of the villages visited (far, medium, and clos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round the tribe, local plants, people, rituals, material culture, buildings, statues, weaving looms and utensils, etc. If the contents of the images are view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quence in which the photos were taken, it is possible to grasp the movement traces and routes of the investigators at that tim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Although the black and white photos are old, they can still show the people, things and details that are brought into focus by the lens. These field photos have also been widely used in research papers and ethnographic publications, and have survived to this day. These photographs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spanning 10 years enrich and illustrate three-dimension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written in each text, assist the presentation of early stud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and support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concepts. These field photos not only “record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utlook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at that time, but also left field footprints and genealogical knowledge for early research on the Austronesian peoples in Taiwan.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photographic ecosystem to sort out the field photography arch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1950 to 1960, and annotates three important nodes of the photos' biography: (1)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photographic imag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onographs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s research results, highlighting the social biographies of this batch of photo files. Here, photography has witnessed fieldwork on the ground, describing the interactions within fieldwork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developed photos and images assist in the presentation of encyclopedic knowledge of subjects. (2) Archiving of physical photos take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subsequent digital files points out the material biographies of the photo files. The conversion from analog to digital material/interface makes the images more "freely" released from the photographs. These photo files that survive in the binary material world of 0 and 1 have more diversified possibilities for application and knowledge extension paths. (3) This batch of photographic images from 60 years ago, through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materials/interfaces, has moved into the field and ecosystem of academic publication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academic thinking, social actions or events. As photo archives move from one ecosystem to another, their use, value, and meaning, including the value of their biographies, have also changed. The scope or boundary of the aforementioned important identifiable nodes is distinguished,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through specific examples and activities. I also discuss the fieldwork concep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methods, researcher--subject relationship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interaction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research at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based on thi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Keywords: Photo archive, Photographic imag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Studies, Academic institutionalization
